

中国国际移民探微

朱国宏

【提要】 作者从移民史学角度,阐述了中国国际移民产生、发展的历史概貌,从秦汉至民国时期,大体经历了发轫、自发、过渡、高潮和持续发展五个阶段;分析了中国国际移民的规模和人口学特征,认为中国国际迁移既有与国际共性的迁移原因,又有其独特的发生机制和运作形式;文章最后论述了中国国际移民在世界移民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者: 朱国宏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

一、历史上的中国国际迁移

中国的国际迁移渊远流长,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发轫阶段。这个阶段的国际迁移具有偶发性特征。迁出者不是为了移居海外,而是另有原因;出国后又因种种因素使其不得不羁留海外。从史籍稽考,中国国际迁移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徐福东渡可能是最早的国际迁移行为。西汉以后,这种偶发的迁移行为逐渐增多,但其迁出仍然是其它原因所致,包括探险、政治流亡、朝贡、僧侣取经弘法等^①。这一阶段的国际迁移行为开拓了最初的中外交往关系,丰富了对海外国家的认识,也取得了海上旅行的经验和知识,从而为下一阶段的国际迁移奠定了基础。

自发阶段。隋唐以后,中国国际迁移进入了自发阶段。这一时期由于中外交往更臻频繁,海上贸易和“丝绸之路”更趋繁荣,海上交通条件也不断改善,出现了具有一定迁移动机的自发迁移行为。这些主动的国际迁移者的迁移流向和分布,成了后来国际迁移流向格局的雏形。

过渡阶段。明末清初,中国国际迁移,已颇引人注目。明清朝廷因惧怕其不利于朝廷统治,加上对迁移者的习惯性贱视,竟不惜破坏生产力、中断海外联系而实行了“海禁”政策。结果是事与愿违。明末清初人口激增的巨大压力、频繁战争和农村严重的土地兼并等,使许多劳动人民不堪困苦,萌生了较强的迁移“推力”;“海禁”又使沿海居民断绝了生路,因而有更多的沿海居民迁居海外,并出现了一定规模的集体迁移。

高潮阶段。中国大规模的国际迁移始于鸦片战争。经济衰退与人口压力,形成了外迁的强劲“推力”;进入18世纪后,西方殖民者开发海外殖民地也进入了“黄金时代”,对劳动力有着强大的需求,中国有着庞大的劳动力市场,早已成为西方殖民者觊觎的目标。

由西方殖民者一手操纵和导演的“苦力贸易”(猪仔贸易),使1000多万中国劳动力被作为“契约华工”迁移海外。值得指出的是,伴随着“苦力贸易”,还出现了一种“赎单”移民。他们迫于国内生存压力,也受着西方殖民者的暗中操纵,大规模地迁移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淘金”。这一阶段形成的国际迁移流向格局,直到今天仍没有大的变动。

持续发展阶段。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国际迁移进入了持续发展阶段。迁移现象时有时无、时多时少,同时迁出与回迁并存。这一阶段的迁移规模,保守估计也超过600万人,仅稍逊于高潮阶段。这一阶段还出现了大规模的回归迁移,大批中国移民再迁移或回迁国内。

中国国际迁移的持续发展,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才告一段落。

二、国际迁移的发生机制及其运作

人口国际迁移既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那么,为什么在同样历史条件下中国国际迁移大多发生在福建、广东两省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大规模的国际迁移是怎样发生的,是否存在着规律性的迁移机制?笔者

就这两个问题试图作些探讨。

一般而言,迁移的发生取决于四个因素:(1)迁出地的因素;(2)迁入地的因素;(3)中介环节的因素;(4)迁移者的因素。其中,每一因素又包含着一定的子因素。从迁出地看,涉及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诸多因素,这些因素耦合在一起,如果构成了促使迁移者迁出的“推力”,那么,就具备了迁出地外迁的因素;迁入地则正相反,诸多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因素耦合在一起,如果构成了吸引迁入的“拉力”,那么,就具备了迁入地的迁入因素。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相互作用构成一股合力,便将促使迁移行为发生。然而,这只是表明了迁移发生的可能性。可能性能否转化为现实,还取决于迁出地与迁入地之间的“中介环节”。只有具备“中介环节”因素,迁移行为才能发生。而“中介环节”同样包含一系列子因素,如距离、交通条件、迁移知识、迁移经验等。这些子因素耦合在一起,如果构成了完备的“中介环节”,那么,也就具备了“中介环节”因素。具备了迁出“推力”、迁入“拉力”和通畅的“中介环节”,迁移的发生几乎就是必然的了。但是,在同样具备以上条件的情况下,并非所有人都能成为迁移者。为什么有些人迁移,而另外一些人并不迁移呢?这又涉及到迁移者自身的因素。迁移者的因素也包含一系列子因素。这些子因素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基本因素,如性别、年龄、健康等;另一部分则是特殊因素,如冒险精神、心理素质等。两部分因素耦合在一起构成了迁移者的特质。只有具备这种特质的人,才能成为迁移者。

如果具备了以上四个方面的条件,那么,迁移的发生也就不可避免了。这是就一般迁移行为而言。国际迁移当然也不例外。只有具备了这四个条件,国际迁移才会发生。我们称之为国际迁移的发生机制及其运作。

那么,中国国际迁移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主要发生在广东、福建两省?而迁入地又为什么集中于东南亚地区?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同样是沿海地区,如山东、江苏、浙江等地,虽然也有国际迁移行为发生,但均未演变为大规模的国际迁移,特别是许多边境省区,直接与外国接壤,也没有演变为大规模的国际迁移。可见广东和福建两省又是具备了特殊条件的迁出地。

前面曾经提到,大规模的中国国际迁移主要发生在晚清时期。在这一时期之所以会出现大规模的国际迁移,从迁出地说,政治上的腐败、沉重的人口压力、经济落后和社会混乱等诸多因素构成了强劲的迁移“推力”;而从迁入地说,东南亚的殖民地开发、劳动力资源的匮乏等诸多因素,构成了强劲的“拉力”。而广东、福建两省与东南亚地区之间又具备了十分通达的“中介环节”因素。首先是距离因素。广东、福建与东南亚地区在地理上邻近,为迁移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条件,使得两地之间的民间交往远在国际迁移发轫以前即已发生。其次是地理环境因素^②。广东、福建和东南亚地区同处于亚热带地区,气温、气候、气压,以及生态环境相似,使广东、福建的移民更容易适应当地的生存环境,在迁入地选择上有相当的优势。再次是人种因素。广东、福建的人种与东南亚地区的人种颇为相近,有着同样的肤色、直发、黑眼睛等;据人种学家考证,闽南人的眼睛与马来亚人的眼睛几乎完全相同,被称为“马来眼”^③,这有助于两地人口的接近、融合,因而也有利于迁移者适应当地的环境。再次是人文因素。据考证,东南亚地区许多国家的生活方式与广东福建颇为相似^④,也有利于迁移者的适应环境。最后是交通条件因素。由于地理上邻近,在造船技术还很低下的时候,广东、福建两省就已能够驾驶小船往来于两地,便利的交通条件无疑为迁移者的迁移提供了条件^⑤。以上这些因素,可以说是“中介环节”的基本因素。至于特定历史条件下迁移的实现,还取决于另外一些“中介环节”因素。那就是中外交往情况、外交关系及各国对待迁移的态度和政策等。因此,从“中介环节”说,大规模国际迁移之所以主要发生在广东、福建与东南亚之间,最主要的就是既具备了距离、地理环境、人种、人文、交通条件等基本要素,又具备了没有移民限制、殖民者的操纵等制度因素,即取决于双方政府(高潮阶段还取决于第三方——殖民者)有关移民的态度、政策等制度上的规定和原则。

再来讨论迁移者的因素。迁移者的因素有两种情况:一是迁移者为什么多为广东、福建人,而不是其它地区人?另一是广东、福建两省人为什么也只有一部分成为迁移者?中国人传统上素来是安土重迁,广东、福建人自然也不例外。然而,在特殊情况下,广东、福建人似乎显得更有冒险精神,更具迁移特质。这是为什么呢?从历史上看,主要是由于广东、福建人具有迁移传统的缘故。在中国历史上,国内迁移是经常性

的,而且曾发生多次大规模的国内迁移。其中影响巨大而源远的就有多次的北方人口大规模外迁。如“永嘉之乱”中的大规模人口南迁,又如“靖康之难”中的大规模人口南迁。人口的大规模南迁,形成了广东、福建两省的民族大融合。而在此之前,福建古称“七闽之地”,系指福建由7支不同的少数民族构成;后又称“东越”,逐渐形成以闽越族为主体的局面。据考证,闽越族系马来人种血统而不是蒙古人种血统。福建的民族融合,起初是闽越内部的融合;到西晋末期,“永嘉之乱,衣冠南渡时,如闽者八族”,又开始了和汉族的融合。最初迁来的这批汉人被称作“旧汉族”,俗称“福老”。在福建与广东交界一带另有一支土著民族——畬族。唐朝时因反抗大汉族歧视政策而遭到镇压。事后,一部分畬族人被迁往浙南、闽东、闽北,同时随军官兵的一部分留在当地,开始汉族与畬族的融合。这批汉人被称为“新汉族”或“客家”。这也是今天仍聚居于福建、广东交界一带的“客家”人的由来。到安史之乱后,河南人王潮、王审知兄弟率军入福建,开始了福建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第三次融合。到了南宋的“靖康之难”,“入闽益众”,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局面。这样,福建除畬族人口较多外,原先闽越族的许多古老民族都消失了,如周代称为“白民”的少数民族,三国时称为“安家”的闽北少数民族,以及唐代称为“木客”、“山都”的闽西少数民族^⑥。少数民族的消失或人口减少,意味着人口中迁移者的成分大大增加,因为福建汉人均是国内移民或其后裔。

因为人口中绝大多数是迁移者或其后裔,也就意味着这一人口群体具有迁移经验、迁移知识,乃至迁移所需的勇气、毅力和冒险精神,亦即具有迁移者所必备的那种迁移禀赋。

至于广东、福建为什么有些人成为迁移者,而另外一些人则没有成为迁移者,则主要在于迁移者自身的特质,如性别、年龄、健康状况,乃至家庭情况、经济情况、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差异。

正因为晚清时期鸦片战争后,包括迁出地、迁入地、中介环节和迁移者四个要素在内的迁移机制逐步成熟,并以“苦力贸易”为契机,所以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国际迁移。这里值得提及的是,迁移发生机制的运作亦须有契机,在这一阶段是“苦力贸易”,而在其它阶段则往往是战争、灾害引起的大饥荒,或宗族械斗、起义失败等。

三、中国国际移民的人口学特征

(一) 移民规模

由于缺乏迁移登记和统计资料,准确的移民规模无从得知。这里试作一估计。

近代以来的国际迁移史可分为两个阶段,晚清时期的高潮阶段和民国时期的持续阶段。在高潮阶段,有一些关于中国移民和华侨人口的估计数字,但相差很大。按笔者的估计,1840~1911年迁出移民总数至少在1000万以上。

在持续阶段,也有不少关于中国移民和华侨人口的估计数字,但多为某一时期的,且相差很大。按笔者最保守的估计,1911~1949年迁出移民总数至少在600万以上。

1840年以前的漫长历史中,究竟有多少中国人迁居海外,迄今未见有估计。有关海外华侨人口的估计说,宋代至鸦片战争前,全球华侨人口大致从几万人增加到100多万人^⑦。如果这一估计与实际情况相吻合,那么,宋代至鸦片战争前由中国迁出的移民数当远远超过100万人。因为,华侨人口所反映的只是现存的移民数(包括侨生),而长达800至1000多年的时间里,生生死死已过了许多代,尽管当时的迁移规模比较小,但年积代累,总共迁出的移民至少也有400万人。

总起来说,1949年以前中国历史上外迁的移民当在2000万人以上。其中,有一半是在高潮阶段迁出的,近1/3是在持续阶段迁出的,另外的1/5则是在1840年以前迁出的。

(二) 迁出地分布

中国移民最主要的迁出地是广东、福建两省。此外,迁出地还分布在东北、东海沿岸的省份和西北、西南的边境省份,甚至也分布在内陆的一些省份。但是,从迁出规模看,广东、福建最多,沿海、边境省份次之,内陆省份最少。可见,中国移民的迁出地分布具有边缘性和集中性两个特征。福建、广东两省,估计迁出移民占全国移民总数的90%左右;其中约60%是广东人,30%是福建人。

在广东、福建两省,迁出地分布同样具有地区性特征,福建的主要迁出地集中在晋江(今泉州市)的晋江县、南安县、永春县、安溪县、惠安县等,莆田(今福州市)的莆田县、仙游县、德化县、平潭县等,龙

溪(今漳州市)的龙溪县、海澄县、东山县、华安县、云霄县、诏安县、漳浦县、南靖县等,龙岩(今龙岩市)的龙岩县、永定县、上杭县、连城县、长汀县、漳平县、宁化县、武平县、永安县等,以及厦门地区(今厦门市)的厦门和同安县^⑧。在广东的主要迁出地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和潭江流域的广州、南海、番禺、顺德、中山、东莞、开平、台山、新会、恩平等市县,潮汕平原的汕头、澄海、潮安、晋宁等市县,兴梅客家地区的兴宁、梅县、大埔、丰顺等县,以及海南岛^⑨。

(三) 迁移流向及迁入地分布

中国移民的迁移流向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同时又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从重要性次序上排列,依次是东南亚地区、北美地区、拉美地区、大洋洲地区、非洲地区、东亚地区、南亚地区和欧洲地区。其中,东南亚地区的中国移民流量最大,近90%;其次是北美和拉美,合计占8%左右;其余分布于其它地区。在东南亚地区,流量比较集中的有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缅甸、越南、柬埔寨、老挝等;北美地区是美国和加拿大;拉美地区主要是秘鲁和古巴;非洲主要是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和南非;东亚主要是日本和朝鲜;南亚主要是印度和尼泊尔;欧洲主要是英国和法国。

不同地区迁出的移民往往迁入不同的地区,从而又形成了海外华侨社会中不同的籍贯构成。这种籍贯构成往往表明了同一地区迁出的移民的群聚倾向,如广东原籍珠江三角洲和潭江流域的移民主要迁往美国、加拿大、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原籍潮州地区的移民主要迁往泰国、越南、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原籍兴梅客家地区的移民主要迁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原籍海南的移民主要迁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和越南。而福建原籍晋江的移民主要迁往菲律宾、印尼和新马;原籍莆田的移民主要迁往新马和印尼;原籍龙溪的移民主要迁往印尼、菲律宾和新马;原籍厦门的移民主要迁往菲律宾、新马、印尼和缅甸。

之所以会形成同一迁出地的移民迁往同一迁入地,血缘、亲缘、地缘起了决定作用。这种作用还使得华侨社会以籍贯或方言结为帮派或会馆,如帮会有福建帮(实则闽南帮)、广府帮(珠江三角洲和潭江流域)、潮州帮(潮汕平原)、客家帮(兴梅客家地区)和海南帮。有时,福建帮又分为闽南帮、福州帮和客家帮。帮会使得后续的国际迁移沿着同一路线迁往同一迁入地,从而使得帮会实力更强,这在国际迁移中起了“惯性作用”。在迁移的后期,这种惯性作用往往日益明显,如在持续阶段,惯性作用已经成为国际迁移机制的一部分。

(四) 移民构成特征

中国移民的构成特征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尽相同。但有些基本特征是相同或相似的。如性别构成以男性为主体,迁移后期随着随迁的增加虽有所改变,但变动甚微,迁移主体始终是男性。性别比逐渐趋于平衡是随着侨生人口的增长及其比例扩大为华侨人口的主体时,才开始出现。

年龄构成以16~40岁的青壮年人口为主体,而16岁以下和40岁以上的数量很少,甚至于没有。只有侨生人口成为华侨人口主体时年龄结构才趋于完整。

文化程度构成则以低文化程度者为主体。历史上外迁的移民大多为简单劳动者,其文化程度以文盲为最多;其次是接受过几年私塾教育的半文盲,至于小学毕业或以上程度的几乎没有或寥寥无几。只是,与当时的社会条件相联系,中国移民的吃苦耐劳精神、工作态度和经验,以及某方面的特殊才能如经商等,仍使中国移民在迁入地做出很好的成绩。因而倒也不能因为文化程度低而一概地斥以人口素质差。

迁出者的职业构成大多为无业游民、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贩,进入迁入地后则大多成为矿场工人、种植园工人、商贩等,职业构成比较单一,与低文化程度是相适应的。

与婚姻方式相联系,中国移民的家庭构成有两类,一类是一次成婚者,其家庭构成无论夫妻团聚与否,均与一般人口无异,有着各种各样的构成方式和状况;另一类是两次乃至多次成婚者,除再婚者外,大多与“异地重婚”有关,因而表现为“两头家制”,其构成比较特殊,特别是中国历史上曾盛行纳妾制度,一夫多妻加上“两头家制”成为复杂的家庭构成。

总之,移民是特殊的人口群体,它具有一系列与一般人口群体迥异的特征。这些特征在迁入地的华侨社会里,直到侨生人口成为华侨人口的主体时才逐渐改变,并过渡到一般人口群体所具有的特征。

四、中国国际迁移的后果

大规模的国际迁移,对迁出和迁入地的社会经济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从迁出地看,大规模的国际迁移,直接的后果是人口的减少,这对于人口爆炸的迁出地来说,意味着人口压力的减轻。中国大规模的人口外迁,对全国的人口发展几乎没有影响,但对福建和广东两省来说,则使人口压力有所缓解。同时,大规模的男性青壮年外迁,还意味着迁出地人口性别年龄构成的变化。许多侨乡调查表明,外迁规模大的侨乡,其性别年龄构成变化也大,在迁出后一段时期里,侨乡成了女性、老年和儿童的社会。并导致了迁出地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后果,诸如劳动力短缺、老年人的赡养、儿童的教育乃至婚姻家庭问题、社区发展问题等。

此外,大规模人口外迁还带来一系列其它后果。首先是家庭的团聚问题,由家庭团聚又引起了随迁问题,或“两头家制”问题。其次是侨汇问题。青壮年男性的外迁意味着家庭强劳动力的流失,这对于以劳动力为主要生产手段的小农经济来说,经济来源的一大部分将取决于侨汇,而侨汇的增加,又引起家庭生活乃至社区生活方式的变化,从而导致社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再次是投资问题。在国外经商贸易的成功者,往往将其资本投资于家乡,这对家乡乃至国家都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据统计,1919~1949年,福建华侨投资于国内的总金额达12250万元(人民币),年平均投资额达408.3万元^⑩。这对国内特别是侨乡的近代工业发展、交通运输条件改善、侨乡城市建设、教育事业等,都起了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最后是对国内政治的参与问题。许多移民迁出后仍心系祖国,从而对祖国的政治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参与,并引起了一系列的后果,如华侨对辛亥革命的参与,对抗日战争的参与,对国内建设的参与等。总之,中国大规模移民外迁对迁出地有着一系列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其后果复杂而又深刻。

中国大规模国际迁移对迁入地同样有巨大影响。

大规模中国移民迁入,其直接后果是满足了迁入地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但随着劳动力需求的饱和,特别是在经济衰退时,大批移民成了迁入地的负担,形成了人口压力。与迁出地相反,移民大规模迁入,改变了迁入地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从而带来了一系列婚姻家庭和社会经济问题。

间接后果主要是华侨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问题。华侨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在迁入地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包括国籍问题、排华问题、政治参与问题等。而每一问题都导致一系列后果,既影响着迁入地社会,又影响着华侨社会本身。其次是经济问题。历经多年的奋斗,许多移民在经济上发展了,在华侨社会中形成了华侨资本。但在与迁入地资本的竞争中,一方面华侨资本对迁入地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则又受到排挤。华侨资本影响之巨大,只举投资一例就足以说明。比如,在菲律宾,1942年华侨资本投资高达1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为1.62亿美元);在印度尼西亚,华侨资本投资为1.5亿美元,占第三位,仅次于荷兰(为10亿美元)和英国(为2亿美元);在泰国,华侨资本投资1亿美元,相当于所有外国人在泰国投资的总和。据估计,华侨资本投资在1956年时,已达31.5亿美元,而到60年代中期达70亿美元^⑪。再次是民族问题。在许多迁入国,华侨是遭受歧视的少数民族。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既有民族纠纷问题,又有民族歧视与排挤问题,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再次是社会问题。移民是特殊的人口群体,而华侨社会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它既带有许多中国传统的色彩,如帮派、会馆等社会组织,又带有当地社会的色彩,特别是侨生。因而,在与当地社会混合时,带来了诸如与当地入通婚问题、犯罪等问题。最后是文化问题。中国移民有着传统的中国文化印记,在进入迁入地后,首先遇到的就是文化适应问题。而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又产生了同化与反同化的问题,其发展变化过程,构成了华侨社会对诸多文化观念和行动的改变。譬如华文教育问题。早期的移民十分重视华文教育,尽管他们自己文化程度均很低,但兴办学校、创立报刊,却十分热心,其目的在于保存传统文化。然而,迫于迁入地的限制和排斥,华文教育出现衰落^⑫。又如思想观念,由早期移民的中国传统观念转变为迁入国观念,即由叶落归根转变为落叶生根,甚至在民族文化、婚姻家庭、宗教信仰等方面也都发生了转变^⑬。

五、中国国际迁移在世界迁移体系中的地位

中国的国际迁移现象发轫早、历史悠久,并在近代形成大规模国际迁移。然而,在有关世界史、世界国际迁移的许多研究中,中国的国际迁移似乎有意无意地被忽视了。譬如世界史研究中,欧洲人口的大规模外

迁被称作人类的又一次全球扩散,一次新的种族再分布,对其意义被详尽地加以强调;发生在非洲的“奴隶贸易”以其大规模迁移的特殊形式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并有着深入而全面的研究^④。又如在世界人口研究中,讨论国际迁移问题时,主要讨论了欧洲和非洲的国际迁移,即使是讨论亚洲近代的国际迁移,也只涉及印度、日本等国,唯独遗漏了中国,而中国的国际迁移恰恰是亚洲中最重要的^⑤。当然,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就研究而言,一方面与研究的侧重点有关,另一方面则与缺乏统计资料有关。如陈达所著《中国移民》(1923)和陈特里所著《中国海外移民史》(1948)^⑥,有关国际迁移的研究均偏重于迁入地一方,并侧重于华侨社会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有关研究,特别是70年代末以来的有关研究,仍承袭了这一研究传统,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⑦。应当说,这是十分可喜的。但是,从世界史和人口国际迁移角度看,这种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正因为如此,已有学者呼吁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移民问题^⑧。

从另一方面说,资料的缺乏也限制了人们对中国国际迁移问题的研究和评价。因而,在进行世界国际迁移比较时,中国的情况也就不可能被列入统计数据库中,从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忽视了。

但是,中国国际迁移在世界迁移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抹杀的。人类历史从近代开始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世界性国际迁移,即欧洲人口的大规模外迁、非洲人口的大规模外迁和中国人口的大规模外迁,其意义只有人类早期的人口全球扩散可堪比拟。但是,多数人只了解前两次大迁移,对于中国的国际迁移就未必了解。实际上,中国的大规模国际迁移,其意义丝毫不亚于欧非大迁移,且有着自己的独特性。

首先,欧洲人口外迁主要始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法国为开拓新大陆殖民地,率先出现移民浪潮,只是最初的规模并不大,且多为殖民者及士兵、穷人、犯人和冒险家,直到19世纪才开始大规模的人口外迁。据估计,16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总计有6 000万欧洲人口迁移海外。其中19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估计有5 000万欧洲人口迁移海外^⑨。另据估计,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欧洲人口外迁总数达5 030万,其中约有1/3没有定居又返回迁出国^⑩。在非洲,最早的“奴隶贸易”发生于1442年,较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则始于1510年。其过程持续4个世纪,直到19世纪末始告结束。迁移高潮发生在18世纪。从16世纪到19世纪,据估计总共迁出“黑奴”达1 500万。其中16世纪90万,17世纪275万,18世纪700万,19世纪400万。另据估计,在这期间非洲人口损失多达3 500~4 000万人,但只有大约1 000万奴隶到达目的地^⑪。而中国的国际迁移早在秦汉时期即已发轫,类似欧洲在地理大发现后开始的自发迁移则从唐朝就已开始,在时间上比欧洲和非洲早了大约8个世纪。至于迁移规模,按笔者比较保守的估计,1840年以前有400万,1840~1911年至少有1 000万,1911~1949年至少有600万,总计在2 000万以上,约为欧洲的1/3,但高于非洲约一倍。分国别看,以外迁人口最多的英国为例,1843~1938年共迁出移民1 506万^⑫。这一时期相当于中国国际迁移的高潮阶段和持续阶段,外迁总数达1 600万以上。可见中国也是近代最大的外迁国之一。但为什么英国的外迁受到注目,而中国则被忽视呢?究其原因,19世纪初英国总人口仅为1000万左右,而中国人口已近3亿。相形之下,人口规模不大的英国在100多年间迁出如此庞大的人口,理所当然地受到关注。中国则相反,迁出同样规模的人口对于中国总人口影响甚微。再者,英国迁出的人口大多代表着殖民帝国,是殖民者;而中国则是被殖民者操纵的“苦力”。在开发殖民地过程中,英国富强了,而中国则没有工业革命,也没有经济起飞。这样,国际社会关注近代欧洲工业化进程,势必要注意到迁移与殖民这一事实;而中国的“苦力”迁移,除了留下一把辛酸泪,在当时并没有引人注目之处。

再与非洲比较,中国外迁移民远超过非洲,非洲人口的大规模外迁之所以引人注目,除了规模庞大外,最主要的是其迁移性质。它是一种特殊的迁移形式。“奴隶贸易”的惨无人道早在实行过程中就遭到抨击,以致于不得不废止。此外,就是对非洲的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灾难性影响。在“奴隶贸易”中,非洲总人口几乎减少了一半。对于中国来说,尽管庞大的外迁对总人口并没有构成影响,但其迁移性质几乎与非洲如出一辙。在非洲是“奴隶贸易”,在中国则是“苦力贸易”;“奴隶贸易”是由欧洲殖民者一手导演的,而“苦力贸易”则是西方殖民者一手操纵的;“奴隶贸易”惨无人道,死亡率最高时高达177%,而“苦力贸易”同样惨无人道,途中死亡率最高时高达640%。更重要的是,“苦力贸易”是在“奴隶贸易”被废止的情况下发生的,是非洲“奴隶贸易”在中国的变相重演。因此,讨论特殊形式的国际迁移时,应当讨论非洲的“奴隶贸易”,但同时也应当讨论中国的“苦力贸易”。

从迁移分布看,欧洲人口主要迁往“新大陆”,非洲人口只迁往美洲,而中国则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各具特征。但中国的国际迁移分布比非洲的国际迁移广泛得多,丝毫不亚于欧洲人口国际迁移的广泛性。在近代的大规模迁移中,中国移民分布于世界各地,英国迁移的流向主要是美国和所谓的“大英帝国”,包括英属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南非,以及其它英属国家。

再从集中性看,在欧洲的人口国际迁移中,爱尔兰的海外人口超过国内人口,常被作为迁移后果巨大的典型例子。而在迁入地,“新大陆”国家几乎成了欧洲人的第二故乡,确实是种族的再分布,以致于这种改变世界种族格局的迁移为“欧洲中心论者”所津津乐道。

中国非没有冒险家,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比麦哲伦的环球航海早1个世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冒险也早80多年。但中国人没有拓殖海外为自己的殖民地,而欧洲人却做了。欧洲移民确实在许多国家里占有优势,其后果与作用十分巨大。非洲移民集中迁往美洲,也有着巨大的后果。而中国的移民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这种集中性对于东南亚地区来说,其影响无疑是深刻而巨大的。

总之,中国的国际迁移是世界近代大规模国际迁移的重要一脉,理应纳入世界国际迁移体系中以研究。这样,才能更全面地认识国际迁移的不同形式和特征,更好地理解国际迁移现象特别是大规模国际迁移的发生机制和契机,及其后果和意义,从而丰富国际迁移理论。

注释:

- ①(日)李国卿《华侨资本的形成和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
- ②霍尔《东南亚史》,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许云樵《南洋史》,星洲世界书局1961年版;陈序经《南洋与中国》,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1948年版。
- ③庄为玟《晋江新志》,新志委员会,1948年版;林惠祥“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58年第1期。
- ④黄滋生、何昆兵《菲律宾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 ⑤章巽《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藤田丰八《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考》,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 ⑥陈景盛《福建历代人口发展概况和民族融合问题初探》,前引文。
- ⑦厦门大学历史所《东南亚论文集》,转引自郑民等著《海外赤子——华侨》,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附表。
- ⑧林金枝、庄为玟《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资料选辑(福建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27页。
- ⑨林厚英《广东人口的国际迁移与华侨》,《人口研究丛刊》,1984年第2期。
- ⑩林金枝《近代福建华侨投资企业的历史及其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3期。
- ⑪孙福生《华人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地位与作用》,华侨历史论丛,1984年第1辑。
- ⑫蔡仁龙《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发展变化试论》,《华侨历史论丛》,1984年第3辑。
- ⑬蒲永瀛《当代福建国际移民过程的效应及其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 ⑭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9、17章。
- ⑮W. S. Woytinsky and E. S. Woytinsky(威汀斯基兄弟),World Population(世界人口),New York,1953年版,第75页。
- ⑯Ta, Chen(陈达),Chinese Migr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Labor Conditions,(中国移民),Washington, 1923年版。
- ⑰王赓武《东南亚与华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226~247页。
- ⑱潘纪一、朱国宏《世界人口通论》,中国人口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 ⑲乌拉尼斯主编《世界各国人口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5页。
- ⑳郭沧萍主编《世界人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42页。
- ㉑P. D. Curtin(柯廷),The Atlantic Slave Trade(大西洋奴隶贸易),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9年版,第268页。
- ㉒根据B. Thomas(托马斯),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迁移和经济增长),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年版,第57、69页资料计算。

(本文责任编辑:杨子慧)